

戴旭

与美军“中国通”的战略对话

戴旭 马伟宁 著 王文 主持

对局？对車？

岂止是交锋

国防大学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戴旭

与美军“中国通”的战略对话

戴旭 马伟宁 著 王文 主持

对局？对車？

岂止是交锋

国防大学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戴旭与美军“中国通”的战略对话 / 戴旭、马伟宁著 .

—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16.1

ISBN 978-7-5626-2365-6

I. ①戴… II. ①戴… III. ①中美关系－研究 IV. ① D82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64273 号

说明：本书个别图片来自网络，如需支付稿酬请与出版社联系。

戴旭与美军“中国通”的战略对话

戴旭 马伟宁 著

出版发行 | 国防大学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海淀区红山口甲 3 号

邮 编 | 100091

电 话 | 010-66772856 010-58678881

特约编辑 | 孟 通

责任编辑 | 黄建国

助理编辑 | 管紫璇

装帧设计 | 杨 宇

责任印制 | 张志杰

责任校对 | 邓彦防

媒体运营 | 刘 冲 刘 峰

经 销 |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正和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 本 |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 17.75

版 次 | 2016 年 0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6 年 0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 205 千字

定 价 | 38.00 元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10-58678881 010-66772856）

（如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

戴旭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

NATIONAL DEFENCE UNIVERSITY PLA CHINA

戴旭简介

戴旭，祖籍河南民权。山西运城入伍。先为地空导弹某部士兵，自军中考入空军通信学校航空兵台长班，后入某空军飞行学院、空军政治学院、某空军指挥学院等工作、学习。现为国防大学教授，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大校军衔。

1991年海湾战争后自学军事。研读西方军事史、中国兵法、毛泽东军事思想，跟踪现代战争和世界格局变化，时发警示，蜚声海内外。1993年发表《以血祭天——一个空军上尉的关于现代战争的预言》；2003年发表《20世纪世界空战》；2009年发表《盛世狼烟》《C形包围》等专著，首次提出美国对华围堵和肢解战略。2010年被中国网民自发评为“互联网九大风云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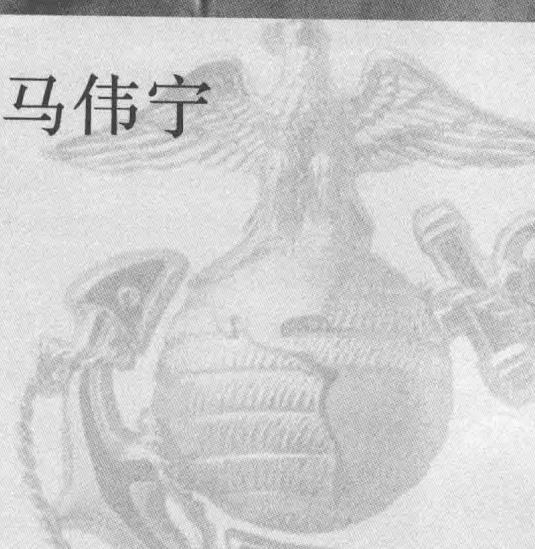
作为中国军队新锐思想代表人物，最早提出世界正处于“第五次战国时代”，当前世界是《一个帝王与三大战场》，主张《中、俄、伊建立大欧亚共同体》《中国需要新型军队》《中国新型军队之鹰击战略》《中国需要空中骑兵军团》《八千里外拦截战争》《南海战略万言书》等。

中国军队中最早应用网络的军人之一，最早提出《美正掀起网络侵华战争》《美国对华攻心战总纲》《网络是捍卫国家利益上甘岭》《“互联网+”战争催生第七代战争》等。

为当代中国政论和军事理论领域有独特建树者，全部著作沿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军事之逻辑脉络展开，穿行于历史、哲学和文学之间，被誉为“有大师气质的战略家”，并广受日本、欧洲、美国、俄罗斯等多方智库关注。著述以逻辑清晰、语言生动、思维超前、观点犀利见长，研究以预测、实用为基本归宿。



美国海军学院教授
原海军陆战队司令顾问小队主任 马伟宁



马伟宁简介

马伟宁，美国海军陆战队中校，AH-1“眼镜蛇”攻击直升机飞行员。

1991年进入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

1993年从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毕业后，升任军官。

1993—1997年通过军官基本培训和飞行员培训。

1997—2002年在367号陆战队飞机营，升任上尉。

1998年跟随15号轮战队远征军分别赴中国香港、新加坡、泰国、阿曼、科威特等地。

2000年随军驻扎日本冲绳，在日本停留半年。

2002年从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领导学专业硕士毕业。同年作为美国海军陆战队三位荣获“奥姆斯泰德”奖学金的军官之一，获得去中国上海复旦大学进修的机会。并在赴上海之前，在华盛顿学习中文一年。

2003年升任少校。

2003—2005年在上海复旦大学做“奥姆斯泰德”基金会访问学者，并取得国际关系博士学位。

离开中国后，他被派到伊拉克。2006年他在伊拉克作战时负责伊拉克陆军后勤培训和支持。他是Al Asad陆军基地后勤团长，效力于驻伊拉克两个美军大队。

回美国后在267号陆战队飞机营任安全和标准主任。

2008年升任31号轮战队远征军的AH-1和UH-1舰长，该远征军到达过日本冲绳，在菲律宾做过双边军事训练、在泰国做过多边军事演习，并在Nargis台风之后对东南亚国家实施人道救援。随远征军回到美国后，任39号陆战队飞行集团人事办公室主任。

2009年收到命令搬至华盛顿，在美国陆军研究办公室任海军陆战队领导人。负责东亚和东南亚事务，兼任亚洲小队主任。同年升至中校。

2011年海军陆战队建立了海军陆战队司令顾问小队，马伟宁是该队首任主任。

2013年在美国海军学院教授中文、中国文化、跨文化建设学，并任语言和文化系副主任。

他的军事勋章包括：功勋奖章（两枚）、联合嘉奖、海军陆战队公列勋章等。

已婚，和夫人萨曼莎女士育有一对双胞胎（男），六岁，现定居在维州。



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常务理事兼秘书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
新华社特约分析师

王文

王文简介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农大人文）执行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江西财经大学等多所高校客座教授、新浪财经、观察者网专栏作家。先后就读于兰州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南京大学—约瑟夫·霍普金斯大学、北京大学。曾任《环球时报》编委（主管评论）和社评起草人，2011年“中国新闻奖”获得者，先后在美国、日本、欧洲、伊朗、土耳其等数十个国家工作或访学，采访过上百位各国政要名流，在《求是》《人民日报》等刊物刊发长篇评论与学术文章200多篇，翻译、主编、合著、专著的著作包括《中国崛起与美国焦虑》《世界治理：一种观念史的研究》《政治思想中的国际关系学》《真话中国》《大国的幻象：行走世界的日记与思考》《金融是杯下午茶》等20余本。2013年初离开媒体界，参与创办新型智库人大重阳。2014年被评为“中国十大智库人物”。目前该智库是入围由美国宾州大学推出的、国际公认度最高的《全球智库报告2014》“全球智库150强”的七家中国智库之一。

刘亚洲：

国家之争，人才之战

读了“对话”，有几点感触。

两个人、两个大国军人，理性，刚性；真实，自然。开门见山，单刀直入。中美外交场景复杂纷繁，而类此者无。戴旭是我老部下，现在国防大学任教，颇了解。视野宏阔，思想奔放，家国情怀，校内外、军内外广受好评。马伟宁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决策项目部主任、“红队”指挥官、海军战争学院教授，阅历丰富，知识渊博。双方虽军衔不高，却“门当户对”，所以，对话意义便超出二人范畴。其对话内容亦然，除两国、两军外俱是世界级政治、军事话题，高屋建瓴。

这种双方中级军官、高级学者点对点的交谈乃至交锋，是中美两国、两军交流的组成部分。相对于国家对国家、军队对军队、代表团对代表团的面对面对话，他们这种单枪匹马式的“过招”，显得非常尖锐和深刻，其间有握手言欢也不乏鼓角争鸣。这种真实，看起来是“交手”，其实是一种“交”“心”的境界。上兵伐谋，攻心为上。而这正是军事的精髓和外交、政治的最高目标。两个人对弈比两群人下棋更耐看，无他，宁静以致远，奇思出妙着。高山之巅伫立的永远都是孤独的背影，思想天空上翱翔着的也永远是寂寥的心声。故，我并不因二人对话之场面小声音弱而忽视。且其中很多的见解令人耳目一新，比如双方对于钓鱼岛中

美冲突话题和最终解决方案，戴旭断言美不敢出兵，并以欧亚大陆做棋盘推演论证，马伟宁坦承战争非美选项，并提出钓岛属台，勇冠古今智越群伦。我支持并鼓励这种“锥子互刺”式的探究，开诚布公式的交流。国防大学担负着外训任务，与外军交流十分广泛，中美高级军事学者这种高质量的对话，是一个非常好的创意。在中美两军交流史上，这种样式是“空前”的，希望不要“绝后”。

中国改革开放面向世界，主要对象是美国；美国筹谋世界，重点也是在琢磨中国。中美互相把对方弄明白，世界上的事就好办；而中美若复杂，世界就无法简单。当下，中美经济关系强，政治关系弱，军事关系若即若离。而军事恰恰是国际关系最真实的一面。一些地方学者总觉得双方战略互疑，这感觉主要就来自军事方面。所以，中美军事关系如何发展、如何演变，是一篇大文章。如何破题？双方国家和军队都在思考。而戴旭和马伟宁以一己之力，千里走单骑，一骑绝尘，隐隐有春秋侠士、秦汉武士之风。美国年轻，军气刚劲；我军未老，英风犹存！二人观点如何姑且不论，于勇武一节，首先就值得点赞！有血性、敢担当，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职业，有不同的内涵。作为国防大学的教授，戴旭无愧。这也是国防大学思想解放、研究深入，学术交流活跃的一个例证。其他如金一南、乔良、任天佑、王宝付等，都在军内外享誉盛名。我常说，思想之树常青。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给思想者特别是年轻的思想者以充足的阳光和水分。

军队是青年的集体，要么身体年轻，要么思想年轻。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就是按照一帮年轻校官的设计打的。英国的富勒和法国的戴高乐都提出装甲兵进攻理论，最后被德国的古德里安采纳，被隆美尔发扬光大。四个人都是校官。日本素来没有哲学，但石原

莞尔在20世纪30年代就看到世界将面临东西方文明大决战，他也是个校官。校级军官承上启下，是军队的中坚。校官的品质决定着军队的品质。

德国军队是近代军制的创新、创建者。原来普军老气横秋，有六十多岁的营长，八十多岁的将官。年老体衰，思想僵化，国王沉迷于华丽的军装和表演性演习。但万幸的是，他们也是一支敢于正视自己，敢于大刀阔斧进行自我改革的军队。近代世界最宏伟的军改大剧，在柏林军事学校校长沙恩霍斯特的导演下开幕了。他是个爱思考的人，当过军事杂志编辑，写过军事论文。在军队服役时，他痛感军事体制陈旧，面对采用新型体制的拿破仑，他提出普鲁士很难打防御战，应主动出击法军。但国王胆小怕事，幻想和平，终致大败亏输。沙恩霍斯特搞了一个“军事协会”，利用军校条件，招揽军中头脑开放的军官，设计普军的军事改革。被世界广为仿效的总参谋部制于此发端。这些人中，就有二十多岁的克劳塞维茨。在论资排辈根深蒂固的军中，沙恩霍斯特敢于大胆启用年轻的思想者，气魄直追汉武帝。

众所周知，德军后来威赫一时。“二战”虽败，但对现代战争艺术的贡献无法否认。古德里安在回忆录中赞扬沙恩霍斯特这位“农民的儿子”是一个“勇敢、聪明、谨慎、严肃、绝不自私、绝不腐化”的伟大军人。而沙恩霍斯特的门生克劳塞维茨，影响更是超出军界和国界。曾任德军参谋长的施利芬说“通过它（《战争论》）造就了整整一代杰出的军人”。

这位“德军改革之父”和战争思想者，是中国军队特别是军校和高层机关应该重点研究的“现象”。曾经有一个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中国大学培养不出世界级创新大师？这个“问

号”叩击的恐怕不仅仅是中国的大学。

自春秋战国之后，整体而言，中国就不再重人才、敬思想。一个“独尊儒术”带来万马齐喑，文化人都去“学而优则仕”，追求当官光宗耀祖了。将军一去，大树飘零。高山之巅无美树，大树之下无美草。漫长史书，政治家招贤纳士如汉高祖如唐太宗者凤毛麟角。近代美国总统却几乎个个如此，美国之智库发达，原因便在于政治需要。所以，今日世界真要论有汉唐之风的国家，怕只有美国合格。中国虽然也附庸风雅地喊重视智库，多是叶公好龙。无论地方、军队名义上似乎都颇看重学历，如当年之“进士出身”，真要他选择职业去向，则多避学校、研究机构而远之，而选“实职”而争之。此恶风不除，则中国历史痼疾终难免复发。

近代以来，中国相对于世界最大的差距是战略思想的荒芜。鸦片战争爆发之后，中国最有眼光的人也不过是写了《海国图志》，教国人知道国外有国，可是这个工作几百年前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就已经做到了。而此时，美国的战略家席华德已经在帮林肯设计太平洋商业帝国了。之后，清朝大臣争论塞防还是海防，而美国的另一个战略家马汉已经为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准备了“制海权”理论。眼界差了多少？如果把国家比公司，美国从一个小地区代理公司起家，百年来做到垄断全世界的规模，靠的是什么？不就是思想家“引路”、军事家“开路”、政治家“驾驶”嘛。而中国自宋以降，就不重视乃至排斥思想家、战略家，看看岳飞、陈亮、辛弃疾的下场，看看戚继光的下场就知道了。到了晚清，思想就像紫禁城的地面，连一株小草也看不见，满朝是人，几个是才？

当年晚清中日之战、中欧之战都是人才之争的结果。曾国藩上书咸丰帝陈述，官场“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人才循循规矩

准绳之中”，“守者”多而“有为者”少。“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光绪帝在《变法上谕》中说：“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人士少……公事以文牍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结果，清朝这个数百年的“大企业”，最后由于“乏才”而“破产”、而“家破人亡”。

思想枯竭、精神萎靡，使晚清一切经济、政治和军事变革统统难落实处。暮鼓晚钟，百年回响。今日中国争衡世界，争什么，怎么争，归根结底不还是人才吗？孙子几千年前比较两国胜负时的五大因素“道、天、地、将、法”，“将”就是决定因素之一。打仗，打“将”，永远如此。而打“将”，主要打的就是思想。

由二人对话，有感而发人才之论，实是情不自禁。中国全面的军事变革拉开帷幕。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上说，推动人才发展体制改革和政策创新，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生动局面。国防大学是全国最高的军事学府，担负着为国家和军队培养人才的战略任务，必须开风气之先。以改革的劲风，荡涤嫉贤妒能、空谈误国之风，淘汰滥竽充数、琐屑颟顸之辈，打破资格、颠覆惯例，提供条件让有真知灼见的人脱颖而出。

国防大学政委 空军上将

马伟宁：

个人一小步， 中美军事关系一大步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朋友王文组织了这么一场对话会。完全是因为王文的构想和努力，才推动了这个对话会成为现实。我还要感谢对话会上我的伙伴戴旭教授，他为了这场对话会付出了大量的私人时间，坚持完成了这场对话。这是我，更确切地说，是我们，共同的期待，希望今天，在这里迈出的一小步，能够推动明天中美两国关系走出一大步。

同样，我要感谢乔治和卡萝尔·奥姆斯泰德基金会（the George and Carol Olmsted Foundation）在十多年前，也就是2003年，出资赞助我到上海学习，并由此开启了我对中国、中国文化、中国社会以及最重要的中国人民的研究生涯。我对能够拥有这样一次宝贵的学习机会心存感激，直到今天，我仍把乔治将军的格言奉为座右铭：“最伟大的领导者必先接受最广泛的教育。”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萨曼莎，感谢她的爱和支持，让我的家庭得以在这些年的旅途辗转中始终团聚在一起。没有她的帮助，一切都不可能实现。

在演讲之前，请允许我声明，我今天发表的言论纯属个人行为，并不代表美国海军陆战队、国防部或者任何一个美国政府机

构。我们只是希望寻求一个坦诚、开放的平台，得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展开中美两国对于一些事情的看法的对话。

在大约十年前，当我还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上尉和“眼镜蛇”攻击直升机飞行员时，我被告知获得极具声望的“奥姆斯泰德”奖学金，并将被派到中国上海复旦大学学习。那一刻，我激动万分，这个我经常在地图上读到的名字——上海，将成为我的目的地。我曾在美国圣迭戈大学学习苏联文学，从来没有想过会有一天我能够有机会来到中国，更别说在这里学习两年半的时间了。

当时，我的学业还没那么繁重，萨曼莎和我就抽出时间游访了中国二十一个省份，五十个城市，从哈尔滨到香港，从上海到日喀则，从昆明到喀什，还包括了台湾。一路上我们遇到了很多人，游览了中国的名山大川，尝遍了中国的美食，并与很多人结成一生的挚友。我们珍惜那段旅程的每一分钟，因为从那里学到的一切是书本上五十年都学不完的东西。

当时，我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师从朱明权教授。在朱教授的指导下，我完成了博士论文《中美军事的合作》。在这篇论文里，我首先回顾了两国建交以来前二十五年的中美关系，由此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中美两国军事关系原本可以如此积极，当然也有诸多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待解。这些问题包括战略互信、国家意图（公开的和未公开的）、国家透明度、军事同盟以及区域关系等，这些都是影响中美双边关系的主要因素。这些问题里很多方面，我们有着超出以往认知的共同的诉求，但其他方面，也存在着很多不和谐的因素。但即使是这样，我仍然坚定地认为，两国寻解这些不和谐因素的唯一途径就是对彼此的利益关切、国家意图以及世界观等进行更为清晰的理解和交流。没有这些基石般地理解和交流，两国未来的合作之路将

会充满荆棘，矛盾和摩擦也将“按下葫芦浮起瓢”。

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我就中美两国军事，其实更为确切地说是两国关系之间的一系列问题表达我的研究和看法。虽然这些是我个人的观点，它们并不代表美国官方立场，但是你们仍然可以从中去体会，在哪些领域我们可以深入合作，在哪些国家利益上我们有着融合点。而就在这些领域和融合点上，我们希望两国有关部门能够在双边军事合作上展开工作（不仅局限于两国军事合作，应该朝着更为深入的、过去从未有过的合作方向上延展），推进双边关系发展。

一开始我想强调几个关键点。首先必须承认，中美军事关系是双边关系最脆弱的部分，是在争端或危机时期被首先叫停也最晚完全恢复的关系。虽然这是出于地缘政治考虑以及经济和外交关系的持续，但同时对两国整体关系也产生了负面影响。两军需要找到一种自上而下的外交方法来庇护我们的这部分关系。为此，我继续提倡建立一个正规化的模式，发出合适的多边会议、培训和演习邀请。我赞成邀请中国参加“环太平洋”演习。我们应该采取下一步行动和工作，找到机会认真对待这些邀请。美国应该发出长期邀请给中国，像“金色眼镜蛇”“亚太安全研究中心（APCSS）课程”和“环太平洋”，这只是几个例子。中国是否参加取决于中国自己的决定，然而破坏关系的原因就将变得明显。中国人民解放军还应该审视他们的运行，例如是否应该永久邀请美国观察或参与。长期有效的邀请、直接沟通、固定和有意义的讨论和交流对两国都好，尤其是在困难和压力时期。

任何地方的军人都肩负着保护他们的人民和国家的责任，他们必须时刻准备着保护自己的国家。有时候这意味着需要未雨绸缪应对任何危机或冲突。这常常需要去评估下一个挑战者或冲突可能来